

少 年 行

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四月十四日，诸葛亮诞生于琅琊国阳都县（今山东沂南）的一个家学传承的官宦之家。

琅琊阳都，处于沂河与东汶河交汇处，西有幞头山，中间是一片冲积平原，山川秀丽，土地肥美。阳都靠近沂河，沂河是纵贯琅琊国直至东海郡北部的水上交通要道，这里又长期是诸侯的封地。所以，这是一块古老、富饶而又并不闭塞的土地。这一区域在文化上属于沂蒙文化区。

沂蒙文化，是今山东省内的一种区域文化，是齐鲁文化的一个分支，也是考古学界通称海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区域文化的命名依据是《尚书·禹贡》上所谓的“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淮河、沂河治理好了，蒙山、羽山就可以种庄稼了）中的沂河和蒙山。而沂河和蒙山，从古到今，都是富有文化底蕴的名山、名水，所以用沂河和蒙山作为区域性标志，

称这一区域的文化为沂蒙文化。这一区域，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来说，包括今临沂市、日照市全境和沂源、临朐、新泰、诸城、峄城、赣榆、新沂、邳县等县区的部分地区。

这里，是齐鲁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洪荒漠漠的四五十万年以前，沂蒙地区的先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在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进步着、发展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远古与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如太昊、少昊等，都与沂水、蒙山有密切的关系。高广仁先生在《莒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提要）》中指出：“公元前 2600 年左右，鲁东南地区作为海岱社会的先进地区之一，率先进入文明时代。”

正是因为沂蒙地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沂蒙地区先民的风土民情、举止言行就更多地摆脱了荒蛮时代原始居民的野蛮性，更具现代人的文明修养。在历史上，沂蒙地区是东夷人重要聚居地之一。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东夷人举止文明而且长寿，有君子不死之国的美誉。孔子创立儒学，尚仁，推重君子，这与沂蒙地区先民传统风俗是一致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沂蒙地区儒学发达。

两汉是沂蒙地区儒学繁荣时期。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沂蒙地区秉承春秋战国儒学发达的传统，形成了研读儒家经典的热潮，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儒

学大家。西汉时，出生于本地著名的儒家学者有：兰陵（今山东苍山）人王臧，精通《诗经》。另一位兰陵人缪生也对《诗经》深有研究，他们是《鲁诗》元老申培的弟子。兰陵人褚大因精研儒学而成为博士。在兰陵儒生中最有名的要数孟卿、孟喜父子。孟卿善治《礼》和《春秋》，孟喜自幼受孟卿影响，又曾从名儒田何的再传弟子学《易》，后来独成一家，有“孟氏易学”之誉。孟卿的弟子后苍为东海郡郯人（今山东郯城）亦精通《诗》、《礼》是《齐诗》、礼学的专家。后苍的学生兰陵人萧望之、匡衡亦是《齐诗》专家，且萧望之能“兼通”五经。临沂人王吉研究《齐论语》成为一代宗师，他又是《春秋彖氏传》的惟一传人。

沂蒙地区在文化传统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术思想的兼融性和学风的经世致用。这一文化特点在《荀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荀子一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兰陵做官、教书，并且死后葬在兰陵。他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法家思想，提出礼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治国方略，主张“隆礼尊贤而正，重法爱民而霸”。他继承儒家重视人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吸收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将二者结合起来，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他还把法家的重君思想和儒家的重民思想融合，提出了尊君重民的主张。而且，荀子利用当地的谜语、快

板、鼓书等艺术形式，写出了《赋篇》和《成相》，特别是《成相》，以简短的韵语写作，便于演唱和流传，向群众传播历史知识，扬善伐恶，并抒发自己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感情。

两汉时期，沂蒙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累世专攻儒经而累代为官的局面，体现了学风的经世致用。例如，临沂人王吉，其本人通晓五经，后举孝廉，官至刺史。其子王骏，曾随梁丘贺学《易》，对《鲁论》也深有研究，后历任谏议大夫、幽州刺史、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王骏子王崇，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后来做了御史大夫，王莽时曾官至大司空。

沂蒙地区除儒学繁荣外，其他各家思想在两汉时期也均有发展，十分活跃。今天临沂北部，战国时属于齐国，这一地区文化受齐文化的影响非常明显。所以，“长于养性”的道家思想及善于治军的法家思想在这一带极为流行。西汉初年，黄老之学曾经是统治的思想，而这一地区又盛行盖公的黄老之学，盖公是胶西人，即今诸城一带，汉属琅玕。这说明沂蒙地区道家思想的活跃。及至东汉后期出现的道教经典《太平清领书》，据史书记载是干吉、宫崇所著，两人均为琅玕人。从晋代王羲之家族“世奉五斗米道”，仍可见这一地区道家思想的活跃。

多种文化在沂蒙地区相互交融吸收，就形成了这一地区以经世致用为突出特点的地域文化，即以儒学

为主，也不排斥法家、黄老之学，目的是为我所用。而且处在山水之间的沂蒙地区的人们，似乎已深得“乐山”、“乐水”之奥妙，所以这一地区仁者与智者层出不穷。

（一）阳都望族

沂蒙这块秀丽的土地，开发比较早，文化也比较发达，因此孕育了许多累世通经、世代官宦的世家大族。阳都诸葛氏就是这样一家有相当根基的官宦士族。

《太平御览》卷470引晋《中兴书》说：“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以忠强立名，子孙代居二千石。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盖海内，为天下盛族。”意思是说，从诸葛亮先祖诸葛丰开始，诸葛氏家族世代为官，特别是到了三国时期，由于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三人分别在蜀、吴、魏三国做官，地位显赫，诸葛氏家族更具有丰采。

诸葛姓氏是怎么来的？自古来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认为自古以来就有姓诸葛的。如传世辑本《世本》说：“有熊氏之后，詹葛氏，宋景公有大夫詹葛祈，其后齐人语讹，以詹葛为诸葛。”这就是说“诸葛”原为“詹葛”，先秦就有此复姓，后来

因为齐国地方的人发声不准，将“詹葛”误称“诸葛”。这种说法，因《世本》一书已经亡佚，詹葛祈又查无此人，现在难以作为证据。

另一种说法认为诸葛氏是葛婴的后裔。应邵在《风俗通》中说：“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葛婴是秦末农民起义首领陈胜手下的将领，后来被陈胜杀害。汉文帝时，为了追录葛婴反秦之功，便把他的子孙封为诸县侯。葛婴后裔，把诸与葛合起来，因此就姓诸葛。这种说法没有史实根据。《汉书·功臣表》记有文帝所封的十侯，既没有葛氏被封侯的，也没有“诸县侯”这一封号。另外，汉文帝所封的这十位诸侯，除少数是协助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的功臣子孙外，大多是文帝时的有功之臣。即便是陈涉，刘邦也不过为其“置守冢三十户”，所以陈涉部下葛婴的子孙不可能封侯。

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阳都原先就有姓葛的，当时的人们为了把从琅玕诸县迁到阳都姓葛的与阳都原有姓葛的区别开来，就把从琅玕诸县迁到阳都姓葛的称诸葛。《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就是这样说的：“其先葛氏，本琅玕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吴书》的作者韦昭（204—273）与诸葛瑾及瑾子诸葛恪是同国、同时代的人，诸葛氏来源的这一说法，极有可能来自诸葛瑾或诸葛恪，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学术界现在多数采用《吴书》的说法，认为诸葛氏的祖先本来姓葛，住在琅玕诸县，后来迁居到阳都。人们为了把这两支葛姓区别开来，就把从诸县迁到阳都的诸葛亮先祖们称为复姓诸葛。

诸葛氏是因葛姓自诸县迁入阳都而得氏，但从谁开始的，目前尚不清楚。《汉书·诸葛丰传》称诸葛丰为琅玕郡人，没有说明是哪个县的，故有人认为诸葛丰为始迁者。诸葛丰出仕时在汉宣、元之际，当时阳都为侯国，属琅玕郡，故诸葛丰应即琅玕阳都人。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诸葛氏家庭中出现了诸葛丰、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乔、诸葛瞻、诸葛融、诸葛恪、诸葛靓、诸葛恢、诸葛长民、诸葛璩、诸葛勛、诸葛颖等有名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中大都是琅玕阳都人。特别是由于诸葛氏家族中出现了千古名相诸葛亮这样的著名历史人物而使诸葛氏家族门第生辉，千古荣耀。

诸葛氏家族自古就有精研儒学的风气，以儒学传家。诸葛亮远祖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先任梁父尉，后升为泰山郡丞，也应当是由察举而步入仕途，而东汉顺帝以后的察举对策是要考试经文和“家法”的。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年少的时候就到京城洛阳游学，主要学习《毛诗》、《尚书》、《左氏春秋》。诸葛亮幼承家学，学习的内容也不外乎此。诸葛亮对《周易》、《公羊春秋》不但熟知，而且

深得其精髓。诸葛亮本人的言论及其政治实践，到处可见儒家思想熏陶的痕迹。诸葛亮为文，或直接引用儒家经典，或述其大义，信手拈来。如《上言尊甘夫人为昭烈皇后》，就引用《礼记》一处：“立爱自亲始 教民孝也 立敬自长始 教民顺也。”引《诗经》二句：“谷则异室 死则同穴。”述其大义一处：“《春秋》之义 母以子贵。”《正议》中的“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等语，都是儒家习用的语言。因此，诸葛亮政治思想的基础，是以儒学为根基的。这说明诸葛氏家族的儒学传统是源远流长的。

但诸葛氏家族又不仅仅拘泥于儒学，其家族文化的传统是兼融了各家的学术思想，吸收了儒家以外的多种思想的养料。例如，诸葛丰虽主治《公羊春秋》，但汉元帝时为司隶校尉，执法严正，“刺举无所避”，其法家思想的影响是显见的。诸葛亮以后在治军治国方面的重“法”，也可找到他的渊源。而且，诸葛亮本人还亲自为后主刘禅写《申》、《韩》、《管子》、《六韬》”更可见他对各家思想的熟悉了。

诸葛氏家族有积极入世的从政传统。诸葛氏家族非常重视“修身”、“养性”，但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兼善天下”，就像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提到的“接世”。诸葛氏家族自其先祖诸葛丰任司隶校尉开始，中经东汉、三国以迄魏晋、隋唐，其从政者可谓代不乏人。尤其是三国时期，诸葛瑾为吴大将

军，诸葛亮为蜀丞相，而其族弟诸葛诞又为魏将军，一门三方为冠盖，并有盛名。他们的子孙后代中，也有不少人从政。如诸葛谨之子诸葛恪，孙诸葛竦、诸葛建；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孙诸葛尚、诸葛京；诸葛诞之子诸葛靓，孙诸葛颐、诸葛恢，都曾担任过一定的政治或军事职务。

诸葛氏家族追求淡泊宁静的人生境界。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无论诸葛亮本人，还是诸葛氏族人，也都以“淡泊”“宁静”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所谓“淡”，既强调“少私寡欲”，又指淡于名利，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所谓“静”，则不单单是讲“养身之静”和“致学之静”，更不是一味求“静”；而是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其最终目的如上所述，还是为了“兼善天下”，为国家社稷出力，为黎民百姓造福。

（二）忠诚家风

千百年来构成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形象的核心是“忠贞”；“忠贞”是贯穿诸葛亮始终的支柱和灵魂。

诸葛亮在追随刘备之后，他曾明确表白自己的心迹，即自己一生的奋斗都是“报先帝”、“忠陛下”。对诸葛亮的耿耿忠心，历朝历代的一些著名诗人、政

治家、军事家、名流雅士以及布衣骚人都有赞叹颂扬。就连一代帝王清朝康熙皇帝也感慨地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为人臣者 惟诸葛亮能如此耳。”

诸葛亮这种忠臣义士之节，我们可以从诸葛氏忠诚刚直的家风找到其历史渊源。

诸葛氏家族十分崇尚气节。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在汉元帝初元五年（前 44），因为明经而任郡文学。他“名特立刚直”，故琅玕人贡禹于汉元帝初年任御史大夫时，即任命诸葛丰作属吏，推为侍御史。汉元帝提拔他任司隶校尉后，诸葛丰尽职尽责，公正无私，“刺举无所避”。京师长安流传着两句歌谣：“间何阔 逢诸葛。”（“为啥长时间见不着 因为碰上了诸葛。”）汉元帝颇为赞赏诸葛丰嫉恶如仇的节操，加封诸葛丰为光禄大夫。

然而，当事情涉及外戚许章时，情况就不同了。当时任侍中的许章，凭借外戚的身份受到信任，骄奢淫逸而不守法度。许章的宾客触犯法律，案件牵涉到许章。诸葛丰据实写好了弹劾的奏章，适逢许章外出而与诸葛丰相遇。诸葛丰停下车，举着皇帝赐予的节大声喝道：“下车！”欲收治许章。许章见此十分害怕，掉转车头飞驰而去。诸葛丰紧追不舍。许章入宫面见了皇帝。汉元帝此时不理诸葛丰的奏章，反而收去了司隶校尉可以代表皇帝收治不法官员的节。在中

国司法史上，司隶校尉被去掉旄节就是从诸葛丰开始的。

诸葛丰既“特立刚直”，对皇帝如此袒护贵戚自然不满意，故他马上上书皇帝说：“我诸葛丰无能而怯懦，行文不能劝善，用武不能压邪。陛下不估量我有没有才能，任命我为司隶校尉；我还没有为皇帝效力，又加秩为光禄大夫。地位高而责任重，不是我应当处的位置。再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担心突然死去，无法报答您的恩德，使谏议的臣子讥笑我于世无补，反而获得尸位素餐的名声，故而经常希望有朝一日拼上性命，把奸臣的头颅斩下，悬在街市上，写清楚他的罪过，让天下四方明确了解作恶应受到惩罚，然后我因而受到杀身之祸，也是心甘情愿的。即便平民百姓，尚有刎颈之交；现在凭四海之大，竟没有尽节死义的臣子，大都是苟合取容，结党营私，只考虑自己家门的利益，忘掉了国家的政局。污浊邪恶之气上触至天，因此灾害多次发生，百姓生活贫困艰难，这是臣子不忠的反映啊！我实在对此感到羞愧不已。一般人的想法，都是希望平安生存而讨厌危险死亡的；然而忠贞的臣子、正直的士子不去躲避祸患的原因是为了君王。”字里行间，流露出刚正不阿之气，忠君报国的拳拳之心。他要求辞仕回家，元帝不允许。

此后，诸葛丰所提建议，皇帝更不采纳。故诸葛丰又上书说：“我听说伯奇很孝顺而为亲人所弃，伍

员忠贞反被国君杀死，隐公慈爱被弟弟杀害，叔武孝悌而为兄所杀，凭着四子的行为，屈原的才能却不能自明反而招致刑戮，难道不值得注意吗！让我遭杀身之祸而使国家安定，被诛戮使国君扬名，我确实愿意；只怕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为那些奸邪的人排斥，让谗谄的人达到目的，堵塞了正直的途径，忠臣伤心，智士闭口，这是我感到害怕的。”诸葛丰的正直得不到皇帝的理解，被调为城门校尉，后又被免为庶人，终老于家。诸葛丰从出仕至被免为庶人，前后仅两年的时间，但诸葛丰的忠贞为国却传为家风，对后代影响很大。

从诸葛丰开创忠诚事主的家风之后，诸葛氏家族代代相袭，及至三国魏晋时期，诸葛氏家族的忠贞之风大放异彩，其流风余韵直到南朝。这种代代相沿的家风，可以说培育了诸葛亮忠臣义士之节。这种家风及诸葛亮的忠臣义士之节，它的直接来源是沂蒙文化的底蕴。在这一方面，对诸葛亮影响最大的两个历史人物是曾子和荀子。

孔子创立儒学，临沂籍的学生有三个，即曾皙、曾参、澹台灭明，其中以曾参成就最高。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又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这些掷地有声的壮语，是曾参发自

内心的自白。我们联系到诸葛亮的政治实践，他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的精神，与曾子之论是一脉相承的。

曾子在战国时影响很大，荀子经常引用曾子的话作为论据。荀子对诸葛亮的影响，我们对比诸葛亮的《论诸子》与荀子的《解蔽篇》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一些重要思想直接继承了荀子的思想。诸葛亮在《论诸子》中说：“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诸葛亮此文，与《荀子·解蔽篇》有诸多相似之处。《解蔽篇》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二者在语法结构及措辞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说《论诸子》脱胎于《解蔽》，并不为过。所不同的是，荀子对墨、道、法三家用“蔽于”与“不知”二词加以评论，诸葛亮则用“长于”和“不可以”二词加以评价。“蔽于”是“被遮蔽”的意思，即深入某一领域而不顾及其他方面。但诸葛亮对诸子是有褒扬、有批评，荀子则仅就其“蔽于”方面论及。我们举此一例，目的就在于说明诸

诸葛亮对荀子思想的继承。就忠诚方面而言，荀子在其著作论及为人、为臣之道时，特别强调忠诚。别人问他怎样做臣子？他回答说：“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终诸葛亮一生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实践了荀子“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的教诲。

(三) 多难童年

诸葛亮出生时，父亲诸葛珪希望这孩子将来前途一片光明，名声响亮，所以给他起了“亮”这个名字。对于诸葛亮来说，所谓父爱，我们所知的仅仅是这一点了。

诸葛亮 3 岁那年，常常有病卧床的母亲章氏撒手离开了人间。这一年，哥哥诸葛瑾年方 10 岁，两个姐姐一个 7 岁，一个 5 岁，而弟弟诸葛均才仅仅 1 岁。为了照顾家庭，抚育孤弱，父亲诸葛珪不久续弦娶妻，把孩子们的继母领进了家门。继母也是一个知书达理、聪明贤惠的母亲，她很爱孩子们，诸葛亮兄弟们对继母也很尊敬。尤其诸葛瑾，“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个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和谐。

然而，好景不长。诸葛亮 8 岁那一年，父亲诸葛珪也因病去世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封建时代，父亲是一家之主，家中的顶梁柱。顶梁柱的崩折，给这个

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诸葛亮悲痛欲绝。一连几天，他常常想起父亲曾经教他吟唱的《梁父吟》那苍凉、悲怆充满无尽忧伤的韵律，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看到哥哥一家连遭不幸，孩子们又弱小，诸葛玄决定承担起抚养侄儿、侄女成人的责任。他很器重诸葛亮，认为这孩子天资聪颖，如果加以精雕细琢，必成大器。他为诸葛亮安排制定了学习计划，对他的学习进行了严格的督导和指导。哥哥诸葛瑾这时因父丧回家守孝，也常常将一些洛阳的见闻讲给诸葛亮听。渐渐地，诸葛亮才开始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

家庭的变化是巨大的，而社会的变化更是惊人。

就在诸葛亮出生的这一年，天下已经不安宁了。北方的鲜卑人正进犯幽、并二州，天下人心惶惶。也是在这一年，汉灵帝别出心裁，在后宫建起了许多店肆，让宫女充当商贩，故意互相偷盗争斗，而灵帝则穿起商人的服装，在店内欣赏、饮宴取乐。他又喜欢在西园内玩狗，并给狗戴上“进贤冠”。这“进贤冠”前高八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本是文官所服，现在竟被戴在了狗的头上，故时人多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说是“王之左右皆狗而冠也”。灵帝又用四头驴驾车，并亲自执辔，四处驰驱，继而京师也纷纷仿效。于是，又有人说：“凡执政者皆如驴也。”

正当这位昏庸的皇帝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之际，中平元年（184），全国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反对

东汉的黑暗统治。这一下灵帝才惊醒过来，连忙四处调集人马来讨伐黄巾军。而天下豪杰也纷纷打着讨伐黄巾军的旗号，招兵买马，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朝廷与地方的合击下，黄巾军被镇压下去了。但参与镇压黄巾军的各路豪杰，却发展成大大小小的军阀。至汉献帝（189—219 年在位）初年，全国各地先后形成了几个大的武装割据集团：公孙度占据了辽东（今辽宁省西部）；公孙瓒占据了幽州（今河北省北部）；袁绍占据了冀、青、并三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山东省东北部和山西省）；袁术占据了江淮地区；曹操占据了兖州（今山东省西部、河南省中东部）；张绣占据了南阳（今河南省西南部）；刘表占据了荆州（今湖北、湖南省）；陶谦占据了徐州（今山东省东南及江苏省北部）；孙策占据了江东（今长江下游以南地区）；刘璋占据了益州（今川、贵、滇地区）；张鲁占据了汉中（今陕西省南部）；马腾、韩遂占据了关陇（今陕西省西部、甘肃、宁夏及青海北部）。这样，东汉中央集权土崩瓦解，各武装集团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连年混战不止。

诸葛亮家乡阳都本来还算是一个宁静之地，但是，一场战争打破了这一地区的平静。

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夏秋，在徐州一带发生了曹操征伐陶谦的战争。原来，曹操的父亲曹嵩，为了避董卓之祸，携带家小投奔琅玕临沂的亲家。曹操

在领兖州牧之后，打算把父亲接到兖州，他命令泰山太守应劭前去迎接。徐州刺史陶谦见曹嵩要离去，不敢怠慢，也派部下张闾带二百骑兵护送。但张闾见曹嵩随身携带的珍宝辎重竟达一百多车，于是起了歹心，在琅玕华县、费县之间，将曹嵩一家数人斩杀，张闾等人拿了钱财，逃往淮南。等应劭赶到，看到这种场面后，害怕曹操归罪于他，也弃官投奔袁绍去了。曹操以此为借口，亲率大军攻打陶谦，连夺十余城。曹操在泗水边上，杀害徐州男女数十万人，泗水拥塞，为之不流。徐州的百姓人心惶惶，纷纷逃离这刀兵四起的战乱之地。

诸葛亮一家也在考虑离开这是非之地，但到哪里安身呢？这时，诸葛玄收到了袁术的一封信，这封信给诸葛亮一家的生活带来了转机。原来，初平四年（193）春天，曹操和袁绍联合攻击袁术，袁术大败。袁术带领余众奔九江，杀了扬州刺史陈温，自领扬州。他来信邀请诸葛玄到扬州的属地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市）做太守。于是一家人就合计起来：诸葛玄原本想带一家人去南昌，但诸葛瑾时已娶妻，而且，继母也需要由他来服侍，所以暂时还不能离开。最后决定，诸葛玄只带诸葛亮、诸葛均及他们的两个姐姐一同赴任，而留下诸葛瑾在家守候。

初平四年秋，13岁的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离开阳都故乡。从阳都到豫章，由北到南，从今山东南部